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三八期 ——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11d)

-
- 【史海钩沉】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 董国强
【研究报告】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
——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 程晓农
【书刊评论】一部校正“集体失忆”的力作
——读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 何 蜀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

• 董国强 •

一、引子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向全国宣告“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紧接着这篇社论的，是新华社长篇电讯〈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 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受到热烈拥护〉，该电讯报导了6月12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情况，并对所谓“六二事件”做出了简要说明〔1〕：

6月1日以前，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位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后，进一步激起了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2日下午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匡亚明领导文化大

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匡亚明以卑鄙毒辣的阴谋手段，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道路。

中共江苏省委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事件，立即派人进行检查，发动南京大学党组织中的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彻底揭发了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现在，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霎时间，地处东南一隅的南京大学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成为路人皆知的“牛鬼蛇神”。

事隔十三年以后，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于1979年2月19日作出了〈关于“六·二”事件的平反决定〉，该文件指出〔2〕：

1966年6月13日《新华日报》和6月16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了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同志，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诬称6月2日发生在溧阳分校的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把分校的一些干部打成“资产积极保皇派”、“黑帮”。这纯属诬蔑、歪曲。为此，校党委决定：对因“六·二”事件受迫害的康贻宽、徐福基、秦向阳、胡福明等同志以及其他干部和群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为甚么人们的理解和评述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文本背后，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真实故事？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1966年初夏的历史现场。

二、溧阳分校的大字报

当年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位于宁杭公路边，距离南京市大约九十公里，原来是溧阳县属下的一个果园，占地面积约为1，320亩。“六二事件”发生的时候，溧阳分校正处于筹建阶段，在这里参加建校劳动的是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五百多位师生。

溧阳分校的创办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产物。早在1961年7月，毛泽东曾经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认为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很好，希望全国学习他们的经验〔3〕。后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和批示，主要内容包括减少课堂教学，加强社会实践，学习“抗大”经验，缩短大学学制等。他认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4〕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高教部和江苏省委的支持下，于1966年1月17日作出了〈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提出将文、史、哲三系迁往溧阳果园，打通合并组建“大文科”，实行“半农半读”的构想。此外还拟定了建设溧阳分校的八点具体方案〔5〕。在全校宣讲该〈决定〉的大会上，匡亚明还提出要让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成为全国高教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工业战线的大庆、农业战线的大寨并驾齐驱。

1966年2月底，文科三系师生在匡亚明的率领下，打着红旗，背着行李，花了三天时

间徒步行军抵达溧阳果园。起初因为没有校舍，师生们分散居住在当地老乡家中。初步安顿下来以后，学校领导计划集中3、4、5三个月的时间建设一批“乾打垒”（6）房屋，先让学生集中居住下来，然后再陆续建一些教室和办公用房，进行半工半读教改实践。一些亲历者为我们描述了他们此后三个月的劳动、生活和学习情况。

一位当年的政治系学生回忆说（7）：

建房子没有石头，我们就到深山里去开采，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拉黄沙，拉石子，这些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干。……劳动的时间太长，就没有时间学习了，课都不能上，唯一的学习就是每天早上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吃完早饭以后马上就要劳动。

劳动太累了，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累得晕倒在地。把他送到校医院后，其他同学都很羡慕他：他可以不用劳动了，而我们还得继续劳动。

除了劳动辛苦以外，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大令人满意。一位当年的历史系学生回忆说（8）：

当时大家最感到头疼的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我们就用水库的水。这个水库原来供应当地几十户老乡的用水，问题并不太大，但是我们一下子去了五百多人，用水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地质系有一个找水专家叫做萧楠森，匡亚明就请他去找水，可是忙活了几天，就是找不到新的水源。因此盛夏来临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缺水的日子不好过。……还有一个就是蚊子。那比南京的蚊子厉害多了。谁愿意呆在农村受蚊虫叮咬呢！因此都想回到南京去。

另外，那些毕业班的学生还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问题忧心忡忡（9）。

由此可见，许多学生对创办溧阳分校是存在抵触情绪的。这种抵触情绪与其说是针对匡亚明个人的，倒不如说是针对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的。但是在当时的舆论压力下，学生们并不敢将自己的不满堂而皇之地表露出来，他们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六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溧阳分校的广大师生是在6月2日早晨的新闻广播中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下午，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等人又联名贴出了〈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10）。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学生也纷纷贴出自己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造成一股很大的声势。

由于当年那些大字报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无法向读者展现那些大字报的原始风貌。不过通过新华社电讯的简要介绍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那些大字报的大致内容还是清楚的：第一是对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表示声援；第二是集中火力批判匡亚明为一位工人来信所写的“按语”；第三是指责匡亚明搞溧阳分校的目的是将南大师生下放到农村去，与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用建校劳动冲击革命大批判。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大字报内容，第一条属于政治表态性质，无须深究；第二条事出有因，本文在稍后还要作出分析说明；第三条则完全不顾溧阳分校筹建的背景和初衷，明显带有“诛心”之论的味道。匡亚明对“六二事件”的过激反应显然与此有重要关联。

三、匡亚明的“反击”

今天的人们在谈到匡亚明的时候，常常会以一种赞誉的口吻提到他的多重身份——革命家、教育家、学问家。但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在四十多年前，这些不同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

气质有时是会发生激烈冲突的。“六二事件”爆发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苦恼恐怕是局外人难以理解和想像的。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浓厚知识份子气质的大学校长，匡亚明有一整套鲜明独特的办学思想。择要说来：第一，他主张依靠知识份子办学。第二，他认为高校应该加强科研工作。第三，他主张尽一切可能改善办学条件。第四，他虽然没有公开否定“又红又专”的口号，但是他强调“红”必须体现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上。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匡亚明无疑会成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学问家。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匡亚明又不得不随时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搞一些与上述教育思想无关甚至冲突的举措。前文所述到溧阳农村去办分校，就是他身上“党性”战胜“个性”的具体表现。

《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苦恼有增无已。在5月7日江苏省委召集的在宁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虽然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斗争”，但是“政治斗争”的确切含义是甚么？斗争的对象是谁？斗争究竟如何开展？中央和省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由于缺乏“通天”的渠道，加上个人政治嗅觉迟钝，匡亚明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根本不可能从毛泽东那些含义晦涩的言谈话语中窥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为了有所动作同时又不致引起太大麻烦，他在5月11日的全校总支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南京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三个步骤：第一是批判“三家村”；第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灭资兴无”自我教育运动；第三是深入进行学校教学改革。按照一般的理解，他的这个决定是比较稳妥的：“三家村”是中央已经定性的“三反份子”，把他们作为批判对象应该没有甚么疑问；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倡导的“斗私批修”、“思想改造”主张的一个积极呼应；而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则是积极贯彻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以后，匡还根据江苏省委的部署，从溧阳分校各年级抽调了十几个能写文章的学生组成“大批判组”，准备写文章批判“三家村”和江苏省委出来的几个本省“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包括南大教授陈嘉、陈瘦竹，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叔平，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等人。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匡亚明主观上对上级的号召是亦步亦趋的。大概唯一可以指责的，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按语”。那还是在《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前，南京的一位青年工人致信南大党委，批评该校中文系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匡亚明对这封来信显然是有看法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他又不便对之公开否定，于是他在指示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这封来信的同时，亲自撰写了一个“编者按”，一方面指出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中，“学生可以批评教员，青年人可以批评老年人，群众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和领导”，另一方面又强调批评“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11）。这个“编者按”的确与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如出一辙。不过这个事件只能说明匡亚明由于消息闭塞，未能及时掌握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最新动向，而不能看作是对伟大领袖的质疑和挑战。

因此在匡亚明自己看来，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在不产阶级“党性”还是在个人“良知”方面都是无可厚非的。因而大字报中那些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无限上纲的“诛心”之论无疑激怒了他。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定势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经验，使他错误地理解了《五一六通知》中所谓“政治斗争”的具体含义。他执着地认为，他匡亚明就是“党的领导”化身；对他的任何批评指责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的蔑视和挑战。

此外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毛泽东的一次与南京大学和前南大党委书记陈毅人有关的谈话。毛泽东在1965年11月视察各地工作时曾经说过（12）：

你们这里有个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1957年大鸣大放时吓昏了，现在到那里去了？（答：下放几年后，现在图书馆工作。）这些人，要看他的变化怎样。当时党内就是不布置，只对党委书记打招呼。但像清华有个党委书记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总支书记、党员、团员都不讲，让右派进攻，让它混战一场。一个学校左派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中间派占大多数，右派极少数，但让他们闹起来，也会猖狂一时。以后遇到备战、形势变化、运动等紧要关头，都要注意让敌人暴露一下。这叫“诱敌深入”嘛！

此时此刻回想起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不能不促使匡亚明将“六二事件”看作一次对他个人的党性和忠诚的严峻考验。如果他对学生的胡闹行为听之任之，就有可能重蹈陈毅人的覆辙。因此他必须立刻组织有效的反击！

一位亲历者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匡亚明获悉“六二事件”后赶往溧阳分校时的杀气（13）：

非常突然地，我在大字报的现场看到了匡校长。

匡校长看到我，冲我摆摆手，我就过去了。

匡校长问我：同学，你见过右派吗？

我说我见过，我们系就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分配，一个月就拿十八块钱。

匡校长说：我告诉你，我在吉林大学，写我大字报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两三千吧，这些人写我大字报，都是右派！

我一听，哎呀，因为我也在批匡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了。这下惹了大祸了。

当天匡亚明就在分校召开了党总支扩大会议和全体党员大会，把学生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布置立即组织反击，并告诫大家“不能手软”。6月3日上午匡亚明再次召集党总支扩大会议，要大家“跟踪追击”，召开“讨论会”批斗有关学生和教师。6月3日下午回到南京，他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通报了“六二事件”以及处理经过，得意地宣称“粉碎了一次六小时的政变”。他还命令溧阳分校负责人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据统计，在6月2日至5日四天的时间里，在溧阳分校遭到批斗的多达七十人，包括学生六十四人、教师四人、工人二人。其中党员九人、团员二十二人。四个团总支书记除一人不在家外，三个全被斗了（14）。

关于匡亚明组织“反击”的具体情形，一位亲历者回忆说（15）：

当时宣布全校停止劳动，召开批判大会。那个时候大多数学生还是跟着学校领导的，立即把我们这几个贴大字报的人孤立起来了。

首先批判几个教师，包括政治系的林××、中文系的胡××、外语系的苏××等人。这些老师当时三十多岁，而我们都是一些年轻学生，所以匡校长认为贴大字报是他们策动的。老师批斗完了，就开始批斗学生干部。第一个被批判的是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的年龄比较大，是调干生，老共产党员。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孙家正，他是中文系的团支书。此外还有政治系的学生朱英才等人……。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批判大会声势浩大，残酷恐怖。所谓批斗会的模式，就是一旦哪个人被确定为批斗对象，立刻就发动群众起来，不管真的假的，统统的往你身上扣，上纲上线，甚至要侮辱你的人格，你根本没有分辩的余地。批斗者使用的都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平时的

各种言行表现，包括个人之间某些极为私密的问题，统统被揭发出来，使人有一种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的感觉。

看到平时我们尊敬的老师被学生围在中间批斗，甚至于有的人开始动手，我们当时站在后面就感到恐怖。

另一个亲历者回忆说（16）：

学校召开党总支扩大会议和全体党员大会之后，我那个党员老乡纠集了我们班八个出身最好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是为甚么〉。这是当年“反右”运动时《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原来写大字报的人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蔫了，八个写反击大字报的同学就很开心，没写大字报的同学则比较轻松，他们可以看热闹。

到了夜里12点，紧急集合。刚刚被任命为我们年级党支部书记的Q老师（原党支部书记藉故离开分校），就到我们这边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他一来就给我们发表演讲，说我们这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和1957年差不多。他还叫写了大字报的人站到右边来，没写大字报的都站到左边去。这样我们无形中就变成右派了。

然后，他要写大字报的人回去反省，准备做检查。这时已经下半夜了，我们写大字报的同学都不敢睡觉，坐在宿舍里学习和写检查。溧阳分校的蚊子又多，遭到蚊虫叮咬，很是受罪。那些没有写大字报的同学这时就贴反击的大字报，那些想入团、入党的同学更积极，他们就牺牲我们了。他们把我们蚊帐的门口都贴上了大字报，我们即使想睡觉也没有办法，因为不敢把他们的大字报撕掉。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整夜都在学习分校发给我们的学习材料，一方面还要写检讨。

以上对“右派”学生、教师的处理办法是否出于匡亚明的直接授意，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不过即使不是出于他的直接授意，匡亚明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亲历者都公道地指出，匡亚明和分校负责人对“反击”目标的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成分，“反击”的方式方法又过于残酷，这不但造成了被批斗者的怨恨，而且使得一些旁观者的感情天平发生了向不利于匡的一端倾斜。

四、江苏省委的介入

当造反学生与匡亚明形成对峙的时候，江苏省委的介入无疑举足轻重。但是这种介入多少显得有些来迟。究其原因，如果说匡亚明未能及时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那么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六二事件”发生以后，江苏省委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不过他们也派了人去溧阳分校，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据一位当年在溧阳分校政治处工作的教师回忆（17）：

在5月25日前后，省委派了一个姓杨的干部作为联络员来到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爆发以后，这位杨联络员就鬼鬼祟祟地到处摸情况，然后再跑到几里路以外的地方给省里打电话，说南大的校长组织对学生进行批斗了。但是这个情况反映到了省里，省里面有底吗？要把匡亚明搞掉，我估计省里面一开始也没有底。

这位老师的说法不是没有来由的。按照一般的分析，既然北大揪出了陆平，那么南大当然可以对等地揪出匡亚明。但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匡亚明，行政六级干部，其资历和声望又岂是“一二九”运动中参加革命的陆平可以相比的？如果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支持，江苏

省委宣布打倒匡亚明，他匡亚明会买账吗？关于此前匡亚明与江苏省委的关系，我们在南大师生中听过许多与以下描述大同小异的说法（18）：

匡的个性比较强，干革命的资历也比较老，行政级别比江渭清他们都高，所以对于省委这些人呢他就不太理睬。省委叫他去开会，他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又对会议没有多大兴趣，他就带一本英文的《资本论》去看。

不过一旦中央作出“倒匡”的决定，江苏省委负责人会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当时在中央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是康生。他接到江苏省委的报告以后迅速做出批示：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判。于是江苏省委于6月6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6月8日，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联络组。在此背景下，溧阳分校的斗争形势迅速出现逆转。

一位亲历者回忆说（19）：

到了6月5、6日的样子，溧阳分校二把手徐福基突然找我们写大字报的人去开会。他向我们传达了匡校长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头搞错了。匡校长和南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

哎哟，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大家都很感动。当时就有人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匡亚明到省里去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省里汇报到了中央，康生听了特别恼火，批评了匡校长，说他整人整得不对。所以匡很快找到了徐福基，下达为我们平反的处理意见，说我们是好人犯错误，学校里不予追究了，所有问题“一风吹”。

那天中午食堂还加餐。大家好几天都没有心情吃饭了，这次算放开了，感到没有事了，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饭。然后又继续劳动。

大概到6月7、8日的样子，我们正在建筑工地筛沙子。

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你们谁写大字报了？

我们不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睬。

他们说：看样子你们是写大字报的，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问他们是哪来的？

他们说江苏省委宣传部的。

我问他们来干什么？

他们说：你们写大字报是对的，你们受委屈了。

我说：你们胡说八道甚么东西呀，匡校长都说我们不是右派了，我们都解放了，我们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们罗索。

另一位亲历者回忆说（20）：

我们写大字报的几个人都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了，都感觉对不起党。实际上江苏省委已经在调查这个事情了。本来省委已经提出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了，本来的斗争对象是吴天石、孙叔平、陶白、叶子铭这些人，想不到匡亚明为镇压学生跳出来了，江苏省立刻抓住不放，派省委宣传部领导率领的调查组进入学校，而我们呢还不知道。

6月8号晚上，学校广播站突然播放《东方红》歌曲，让全体学生到大操场集合。

我们集合以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在会上向全体学生宣布：明天你们就看不到匡校长和分校的其他干部了，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被调走了。他还说：同学们你们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是对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不是反党先锋，而是革命先锋！

听完这个话以后，我们都激动得哭了。当时孙家正带领我们高呼口号，心里面激动啊！而批斗过我们的那些同学都呆住了。但是，那几个被批判的、被拳打脚踢的老师还不敢动。

然而省委的介入也诱发了一些新问题。一位亲历者告诉我们（21）：

省委调查组在大会上宣布支持我们，下面是欢声雷动。

突然有人提出：“我们写大字报的人是革命急先锋，那些整我们的人是甚么？”当时大家认为被整了，心里不平衡，所以有点想报复原来整我们的人。

省委的人就讲：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大批判，主要矛头要对准匡亚明，批判〈二月提纲〉。同学们互相之间不要再纠缠了。

但是他们的这些话没有多少人听。分校实际上陷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大概到了9号，南京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从南京来到溧阳分校。小轿车一进分校的大门，大家就把他围起来了。他向我们传达省委的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等同了。第三，溧阳分校的同学要坚守溧阳，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继续劳动建校，那个时候溧阳分校严重缺水，挖井又挖不出水来，大家洗澡也渐渐困难。晚上蚊子又多，大家觉得这个夏天怎么过呀！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们要求回校干革命。”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马上就有人坐在小轿车的顶上，大家就要求回校。

组织部长说：不能回去，你们要在分校进行文化大革命。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回南大去闹革命。还有人说：怕甚么，我们自己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组织部长见控制不住局势了，想溜。同学不让他走，叫他打电话反映学生的要求。

最后，江苏省委从南京军区借了几十辆军用卡车，把我们在溧阳的所有南大师生都接回南京。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6月10日和12日又发表谈话。听到传达以后，江渭清从华东局回到南京，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22）。等到溧阳分校师生返校的时候，这边早已做好了准备，不但留在南大本部的所有理科学生被组织起来夹道欢迎溧阳分校师生“胜利凯旋”，许多其他在宁单位也敲锣打鼓来到南大，对溧阳分校师生“倒匡”表示声援。一位当年的溧阳分校学生回忆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欢迎场面，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23）：

我们乘坐的汽车开到汉口路的路口，整个南大沸腾了！理科的学生早已等候在那里，一看到我们，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欢呼雀跃，大家一起握手拥抱。

我们以一种英雄凯旋式的姿态，受到火一般热情的夹道欢迎，所以那个心情啊就特别激动！当时那个情形啊，真是人山人海！我们都激动的哭了。

12日下午，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匡亚明的罪行。除了南大师生以外，参加大会的还有南京各大专院校推派的大批代表。大会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宣布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全场热烈欢腾，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紧接着，分校师生代表胡才基等人在台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了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校本部学生代表陈季平在大会上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分校学生唐力行、王世泰、杨家玉、张秋良等纷纷表示：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对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撑腰。参加大会的各大专院校师生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斗争（24）。

此后事态的发展，在江渭清的回忆录中有简略的描述（25）：

《新华日报》从6月13日起，除错误地公开报导撤销匡亚明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外，还错误地开始了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钱静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等同志的点名批判。当时，曾有二十万人涌到南京大学“声援”，校园里除大字报之外，还扯起了广播喇叭，操场上搭起了台子，一些人登台讲演，展开所谓“大辩论”。

一位教师回忆了后来学生斗争匡亚明的情况（26）：

当时在南大大操场批斗了匡亚明，我印象当中中文系的学生胡才基等人是批斗的主力，他们起来揭露匡亚明的“叛徒”问题。就这样开始了对匡亚明进行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泼墨水，有的学生还让匡“坐飞机”。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江苏省委于6月15日向南大派出了由汪冰石任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林克任副队长的工作队（27）。7月4日，省委又改派彭冲为南京大学工作队队长兼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同日，省委工作队和南大党委发出〈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赵复华、胡才基等人被任命为溧阳分校党总支负责人（28）。

至此，南大学生的“倒匡”运动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五、“倒匡”事件的历史反思

南京大学的“倒匡”事件无疑标志着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南大“倒匡”事件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介入事件的学生、教师和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在“六二事件”爆发前都与匡亚明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客观地讲，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就造反的学生而言，最初令他们感到不满的无非是艰苦的建校劳动和闭塞的乡村文化生活，他们的最基本诉求无非就是尽早离开农村回到城市。这至多表明毛泽东时代长期的理想主义和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实际上收效甚微。就匡亚明而言，他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无非是希望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与此前许多教育家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契合的，似乎也没有多少值得指责的地方。那么，这样一些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多大错误的想法，为甚么在当时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这样一些原本善良的人们，为甚么最后会走到暴力对抗的边缘？是甚么

因素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激化，最终给大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从某种意义上讲，造反学生和匡亚明都是极“左”观念的受害者。一位当年的造反学生在接受我们访谈时，并不讳言自己那一代人是“吃狼奶长大的”，他们从小学到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忘旧社会的苦，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不讲人情，斗争哲学”之类的信条。另一位当年参与镇压学生的党员教师则十分强调“反右运动”对学校当局和他个人的深刻影响，当大字报铺天盖地袭来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右派份子向党进攻”。联系到当年的特殊语境，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上述言说的真实性。它们的确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奇特影像。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矛盾双方的那些过火言行就不难理解了——那些言行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外在表现。

然而，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极“左”观念难道是“六二事件”成因的唯一解释吗？在“倒匡”学生与匡亚明的思想深处，有没有其他值得检讨的东西？造反学生在高压状态下的犬儒主义倾向，以及后来在自在状态下的暴民主义倾向，是否都反映出他们的人格缺损？匡亚明固执地把自己看作“政治正确”的化身，丝毫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这是否意味着在他身上“民主”观念的淡漠和封建家长制作风的根深蒂固？此外，江苏省委对于筹建溧阳分校以及南大党委的其他各项工作负有领导责任，但是当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时候，省委主要负责人不是勇于承担责任，而是见风使舵，大玩“丢车保帅”的把戏，其“党性”和“人格”难道没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吗？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参与演出“六二事件”的有关各方都不是最后的赢家：匡亚明虽然在“六二事件”之后的几天里依靠高压手段制服了造反学生，但是江苏省委介入后，他在南大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个人遭到批斗和长期监禁；江苏省委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也只能自保于一时，8月以后群众运动的汹涌波涛迅速将旧省委吞没，省委主要负责人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南大的学生造反派尽管在“文革”前期的“造反”、“夺权”运动中风光一时，但是到1968年3月江苏省实现“大联合”之后他们立刻遭到唾弃，在“清队”、“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受到批斗、监禁，许多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由此可见，当基本的政治伦理丧失以后，政治就变成了一场危险的赌博游戏。如果一个社会容忍了对少数人权利的践踏，那么其他社会成员权利的丧失，就只是时间问题。

在南大校史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如下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文革”爆发时，全校有教职工2,784人，学生5,911人，共8,695人。“文革”期间立案审查的533人，面上审查的100人，计633人，占全校总人数的7.3%（不包括清查“五一六”期间受审查的800多人）。当时有教授70人，副教授35人，计105人。除一人因病住医院于1968年病逝未受冲击外，104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和冲击，绝大多数被抄家、挂牌、关“牛棚”，不少人被扣上“特务”、“叛徒”、“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全校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32人。审查中，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27人。“文革”结束后，南大共清理、销毁各种检举揭发材料重量达3,219斤（29）。

就全国的情况而言，南京大学的“文革”还不算是十分惨烈的……

注释：

1、10、14、24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6日。

2 〈关于“六·二”事件的平反决定〉，载《南大百年实录——南京大学史料选》，下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590—591。

3 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282。

- 4 毛泽东：〈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1965年12月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93。
- 5 〈南京大学党委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96—97。
- 6 “乾打垒”是一种用毛竹、稻草、泥土和石棉瓦搭成的简陋房屋。
- 7、15、20、23 笔者与J先生的访谈记录，2006年3月10日。
- 8、13、16、18、19、21 笔者与C先生的访谈记录，2006年3月1日。
- 9、17、26 笔者与G先生的访谈记录，2006年3月9日。
- 11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376。
- 12 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各地工作时的讲话〉（1965年11月），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 22、25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515；516—17。
- 27 〈省委南京大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南大党委联合通知（第一号）〉，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235。
- 28 〈工作队、党委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237。
- 29 〈南京大学落实政策工作总结〉，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602—603。

□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四期2006年9月30日

~~~~~

# 【研究报告】

## 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 ——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

• 程晓农 •

在有关共产党国家政治演变的研究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向被视为毛泽东独创的异想天开的政治试验。中国和西方的学者谈到“文革”这一概念或政治运动本身时，往往不约而同地把它与毛泽东时代的最后10年联系在一起。其实，“文化革命”并非毛泽东独创，而是他从苏联模仿来的政治舶来品；“文化革命”的始祖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

早在1928年到1931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其政策话语里，从苏联模仿来的“文化革命”一词曾频繁出现在重要的党政文件里。从1964年到1966年8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也与苏联30多年前推行过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将一场类似于苏联的“文化革命”转变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产生了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更为恶劣、广泛、深刻的后果。

1978年，美国的苏联问题学者费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编辑出版了一本《俄国的文化革命，1928—1931》〔1〕，介绍苏联的“文化革命”。1985年，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派珀(Suzanne Pepper)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此书。〔2〕派珀在书评中提到，费茨派垂克关于苏联“文化革命”的书本来应该引起西方国家许多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之人士的兴趣，但令人惊讶的是，事实上这些人对此书知之甚少。〔3〕

派珀的书评发表至今已20余年。尽管中国的“文化革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从概念到方法有种种相似之处，但无论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还是苏联问题专家，通常都只观察分

析单一国家的“文革”，很少有人将中苏两国的“文化革命”纳入比较研究的范畴，因而研究者和读者都没有机会通过“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发现单一国家“文革”研究不容易发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Rodrick MacFarquhar）关于中国“文化革命”的三卷本专著〔4〕探讨“文化革命”的起源时，把“文革”解释为“百花齐放”和“反右”的延伸，由此回溯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这一角度虽然将苏联因素引入了关于中国“文革”的研究，但麦克法夸并未把苏联的“文化革命”纳入分析，自然也无法从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文化革命”的比较中得出任何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初步分析这两场“文化革命”的异同，从中提出一些供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 一、苏联的“文化革命”：“文化专制”加“文化进步”

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不管其政治主张是左翼还是右翼——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强调文化对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启蒙大众来提升民众的素质，进而在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整合社会。政治倾向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各自都把自己的文化认知视为底层民众应当接受的样板，在俄共（布）党内也是如此。“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左翼“前进派”高度强调，在政治和社会转变之后，文化的转型必须立即跟进。“前进派”的领导人阿列克桑德·波哥达诺夫主张，革命成功之后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新文化应当有全新的艺术、文学、生活习惯和伦理，那时候文化领域要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掌权。〔5〕

“文化革命”的想法即由此而来。而俄共（布）的主流势力，比如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文化其实是超越阶级的，俄国的问题主要是文化的落后，而不是把文化“无产阶级化”。1922年到1923年，在列宁生命的晚期，他还在文章中强调，推动文化的进步应当包括克服农民社会的落后性、培养讲究卫生和效率的习惯、破除对科学技术的迷信。〔6〕

在斯大林推出“文化革命”政策之前，“文化革命”这个词在俄共（布）的话语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准确定义的比喻。

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该词的英译是Great Breakthrough in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中国读者或许会由此联想到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类似口号），“文化革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斯大林出于其政治目的，在文化政策方面基本上采纳了俄共（布）“前进派”的激进主张。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对抗，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在俄文里这个词的原意是“阶级战争”）造就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来占领教育文化阵地，形成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7〕

因此，苏联在1928年到1931年间所推行的“文化革命”，并不单纯是列宁主张的那种“文化进步运动”，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在提升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为实现当局的“文化专制”服务。

由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依赖于思想专制，因此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政治观念都被视为“异端”，而任何不愿意充当执政党“应声虫”的人都被看作是潜在的“阶级敌人”。这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导致苏共当局对“十月革命”后仍然留在专业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对共产党不能彻底控制教育文化领域耿耿于怀。这种情境下，借推行“文化革命”政策而实现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似乎是这种制度的必经之途。斯大林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成为专家，成为自己事业的主人”〔8〕；他强调，

“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管好自己的国家”。〔9〕

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以及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经常本着良知对共产党的政策提出批评，希望共产党能纠正一些不应发生的错误。哪怕这类批评有时只不过是私下里传播的微词贬语，在极权国家里，这仍然被当局视为对极权主义政党与领袖之权威及正确性的挑战。回顾苏联“文化革命”的历史背景，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强制型农业集体化导致农民的反抗和农村的大范围饥谨，最后导致数百万农民饥饿而死〔10〕；同时，快速工业化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11〕。对自身错误极为敏感的苏联当局，自然不愿意再听到任何“杂音”，即便是真话、实话也会令自诩“永远正确”的苏共感到难堪。当然，消灭“杂音”要另找理由，于是就有了用“阶级斗争”作借口来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苏联的“文化革命”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步骤。首先，当局精心组织了一些公开的政治性审判，如1928年的沙赫基审判和1930年的“工业党”审判，声称工程师和“资产阶级专家”是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反革命集团”，透过官方的报纸广播对全国详细报导这些审判过程，形成对非党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强大政治压力，为把这些人从原有岗位上赶下来造舆论；其次，通过大规模的短期培训计划，将工人培养成工程师和企业主管，将农民培养成农业集体化后新成立的集体农庄的负责人，将忠于共产党的人士派去掌管文化艺术团体和研究机构。随后，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大批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被迫离开原职，而大批共产党支持重用的激进分子占据了大学、研究所、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的领导职位。〔12〕同时，大批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许多“阶级敌人”的子女被所在学校开除。〔13〕当局还授意基层的激进分子关闭教堂，逮捕了大批神父。此外，当局也发动了提升工人农民文明程度的社会运动，包括培养工农大众建立良好的基本卫生习惯、改进口语中的粗俗俚语、阅读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观看古典歌剧舞剧等。

在苏联“文化革命”的开始阶段，激进的青年人扮演了先锋的角色。经过苏共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宣传教育，192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社会里，青年人当中出现了一大批急于在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的激进分子。“文化革命”开始时，这些青年人冲击中学和大学，把“资产阶级专家”赶出研究机构，袭击教堂，声称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要废除货币、家庭和法律。〔14〕

尽管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时采纳了俄共（布）早年“前进派”的激进主张，但他走得不远，一旦政治上达到了“占领教育文化阵地”的目的，斯大林就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了。1931年，斯大林发表了“经济建设的新条件、新任务”这一讲话，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暂告一段落。

苏联的“文化革命”将大量非共产党知识分子逐离岗位，以“马克思主义斗士”和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取而代之。斯大林宣布，经过这场运动，大部分沙皇俄国时代留下来的技术精英现在是可以信任的了〔15〕，从此共产党实现了对教育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1932年4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决议宣布，解散所有现存的文学和艺术家社团，用统一的“全苏文学与艺术家协会”代替。〔16〕紧接着，斯大林在同年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会议上宣布，在短短的一年里，二百万农民经过短暂训练走上了集体农庄的管理岗位，而11万工程师和农业经济学家则被从城市驱逐到乡村去，同时，农村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17〕随后，为了暂时安抚知识分子，斯大林黜降了一些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最活跃的“打手”，解散了“文化革命”时期的应景产物“共产党人科学院”。〔18〕

## 二、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异同

1966年夏，中国的官方媒体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对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的故意曲解。“文化革命”不仅在“共产主义阵营”里早有先例，而且中共也在1958年正式宣布过“文化革命开始了”。〔19〕据史而断，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革”其实是中共执政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1960年代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中共的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1949年中共建政前新华社就介绍过苏联的“文化革命计划”。〔20〕建政之初，中共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把斯大林的制度架构和统治手段当作治国“宝典”。所谓的“苏联模式”有一系列施政特点，例如，建立政权之后经过将近10年的稳定期，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为此需要强制型农业集体化，与此同时实行打击知识分子和普及大众教育的“文化革命”，伴之以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共执政后的政策轨迹与此基本相同，只是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时间与苏联稍有差异。凑巧的是，中共建政后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起始时间恰恰与苏联同步，1958年中共首次宣布“文化革命开始了”，正是执政将近10年之时。

1950年代，随着中国的“全盘苏化”，中共把“文化革命”作为“苏联经验”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搬到了中国，但不同阶段对“文化革命”的解释却视政治需要而随时变化。例如，1956年1月24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21〕

按照这一说法，似乎“文化革命”就不是打击知识分子，而是依靠知识分子了。几个月以后，刘少奇1956年9月15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则把“文化革命”说成是“文化教育”的另一种表达：“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在12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22〕

“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敌意越来越深，对“文化革命”的提法也相应“革命化”了。在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刘少奇的说法是：“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同时他还提出，要“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3〕这一政策设想基本上是斯大林“文化革命”计划的翻版。

按照中共的最初设计，“文化革命”是“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不甘于屈居“晚辈”赫鲁晓夫之下、急于争当共产主义阵营新领袖的毛泽东求功心切，不择手段，结果他的“大跃进”比苏联的“大跃进”失败得更惨。于是，中共不得不选择休养生息之策，毛泽东也黯然退居“二线”，将烂摊子交给刘少奇等人收拾，中国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无疾而终。然而，“文化革命”这个政治口号和政策设想却一直留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

1962年，毛泽东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旗帜，试图夺回对政局的绝对控制权，他选择文化领域为突破口〔24〕，“文化革命”又卷土重来。按照1964年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说法：“文化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目标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25〕

在当时的官方话语〔26〕和一些文人的应景文章〔27〕中，这场“文化革命”有时又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其政策含义与斯大林模式的“文化革命”并无二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这种他们十分熟悉的“文化革命”不仅没有任何抵触，而且积极参与。刘少奇个人对毛泽东掩藏在“文化革命”旗帜背后的真正用心察觉与否，其实无法阻止“文化革命”的发生。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从1966年开始刻意换用他那套毛主义的“文革”话语，以区别于以往中共推行的斯大林式“文化革命”，其中最主要的话语就是为党内“大清洗”制造舆论准备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继续革命”等“理论”。1969年4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九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专门解释了“文革”的“准备”过程。然而，此报告一字未提中共在1966年以前所主张的“文化革命”，仿佛那个“文化革命”从来就未存在过。历史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掩盖了，从此以讹传讹，人们普遍接收了官方的这一说法，仿佛1966年发动的“文革”还真是“史无前例”的。

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政策时，可以说是就事论事，达到目的便及时收兵。苏联的“文化革命”结束后，政局仅仅平静了几年，斯大林又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著名的“大清洗”。随着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送上审判台，全国有大批苏共中央委员、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秘密逮捕，送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时代，就象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中所描绘的，人人都害怕秘密警察的黑色轿车停在自己住宅的楼下。正是在这种恐惧的气氛中产生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个黑色政治幽默：一个人感到最轻松自在（在俄语中这个词也表示“幸福”）的时刻，是秘密警察来敲门抓人时，发现不是来逮捕自己，那就可以响亮地告诉秘密警察，“你们找错了，那个人住在隔壁”。

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就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中苏两党及其控制下的极权社会其实有着文化特质上的重大区别，这决定了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

苏联的“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驯化出独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原来是工人、农民，通过速成的专业教育就转行成为专业人士或管理干部。其特点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但与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不同，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进步和世界事务缺乏兴趣，而专注于工艺技术方面的小发明，或热衷于落后省分开发、行政管理以及工商管理方面胆大妄为的计划。（28）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自从1960年代中共提出“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之后，教育部门对在校大学生和调干生的培养，产生了与苏联“文革”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特质相近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当中的党、团干部又十分典型地集中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色。比如，在他们的个人知识积累当中，理工专业以外的知识以官方意识形态教条为主，缺乏人文素养，未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虽有大学学历却对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鲜有认识，政治上自觉扮演“积极分子”的角色，热衷于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甘当“驯服工具”，没有独立思考的兴趣和能力。当“又红又专”的这一代按照年龄阶梯升入权力高层之后，他们的人格缺陷对国家的政治走向有很大的影响。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多数成了共产党技术官僚的中坚，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一代”（29）。统治精英个性、能力上的趋同化，体现在治国方面就表现为“勃列日涅夫时代”僵化保守的政治特征。

以上分析说明，对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政府而言，“文化革命”是极权主义统治彻底控制文化教育领域的必然过程。就此而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

绝非偶然，因为“文化革命”是共产党极权制度内生的、为全面达成极权主义控制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当然，毛泽东对1966年的“文化革命”之种种操纵设计还有其个人政治动机。

### 三、提升还是降低社会的文明程度：中苏两党文化特质的体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远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恶劣，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之外，还与中共的文化特质有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中国传承者全盘继承了苏联“导师”们的政治遗产，但却抛弃了苏联“导师”们基于俄国历史文化传统而维持不坠的那种对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尊重，这与中国传承者自己的文化特质有密切关系。

在共产党国家，执政党的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因为极权体制下执政党只允许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活动，它宣称自己的成员“天然”地代表着“先进文化”，因此在贯彻其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的过程中，执政党成员的文化素质必然支配整个社会文明的演变。由于执政党的集权性质和民众自下而上的盲从，其领导集团的文化素质又对社会的文明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中苏两党建政时期领导集团文化素质的差异使得两国“文化革命”对社会的文明演变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众所周知，俄共（布）的领导集团以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总体上对现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在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过程当中以及“文化革命”之后，苏联当局始终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希望把工人农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布尔乔亚”的文化层次上去。

在苏联的“文化革命”年代，当局提倡的“文化”包含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低层次的“文化”是基本的卫生习惯，如洗手时要用肥皂，要每天刷牙，不随地吐痰，扫除文盲等。这主要是针对苏联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涌入城市的农民的生活习惯提出来的，旨在消除社会生活中落后与不文明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城镇居民而言的，要求大家注意餐桌上的举止、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对女性的礼貌谦让，还要求大家掌握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知识；第三个层次是礼仪文化，它曾一度被称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化，这包括要保持良好仪态、说话时用语优雅、穿着整洁适当，还要具备一些对古典文学、古典音乐和芭蕾舞等高雅文化的鉴赏能力。总之，苏联当局希望企业管理阶层和新政治精英能达到礼仪文化所要求的水平。（30）

虽然苏联当局排斥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但它对科学本身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尊重。当局对苏联科学院的态度就是一个例证。在“文化革命”和历次政治迫害当中，苏联科学院的制度从未受到冲击，科学院院士的精英和特权地位也一直受到保护。（31）

“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吗？”这是苏联“文化革命”后，即1930年代在社会上广泛讨论的一场社会文明运动的主题。在此笔者抄录一份刊登在1936年苏联媒体上的“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10个问题”（32），在当时苏联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团体配合共产党的“社会文明教育”宣传中，它很有代表性。

“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十个问题”：

- 1.能否完整地背诵普希金的一首诗歌？
- 2.能否说出莎士比亚的5部剧作的名字和主要特点？
- 3.能否列举非洲的4条河流的名称？
- 4.能否说出你最喜欢的作曲家的名字以及他的3首代表性作品？



- 5.能否列举 5 枚关于苏联汽车的邮票？
- 6.能否不假思索地用小数报出分数  $3/8$  的数值？
- 7.能否说出上一个赛季最重要的体育比赛以及它们的结果？
- 8.能否介绍一下上个季度杰出艺术家拍摄的你最喜欢的照片中的 3 幅？
- 9.您读过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吗？
- 10.详细地说一下，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会出现“斯达汉诺夫运动”？

在这 10 个问题中，只有最后一个有意识形态色彩，而其他问题都与提升大众的文明程度有关。虽然苏联当局并不要求工人农民都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在大、中学生和机关干部当中，“当一个有文化的人”却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当然，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尽管苏联的极权体制延续了将近 70 年，苏联民众不得不生活在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洗脑教育中，但苏共文化政策的现代文明取向对苏联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得苏联民众在培养基本文化素质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传统。从政治之外的文化层面上看，苏联民众平均的文明素质并不低于自由民主国家国民的水准。这样的文明素质与俄国政治转型的平稳性有很大的关系。

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作为“革命党”的中共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党，其早年政治领袖当中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纷纷落马，自 1930 年代初期开始，占据领导岗位的党内精英集团成员大多数未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多数领导集团成员长期生活在偏僻荒凉的山区，“占山为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现代文明处于隔离状态。在长期依靠低文化程度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夺取和掌握政权的过程中，中共习惯于打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抬高工农干部，形成了工农干部“老粗”高人一等的党内传统。这种局面自从“延安整风”之后愈发严重了。自中共“七大”开始，中共党内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则成了党内至高无上的“君主”，毛泽东的个人文化素质因此对中共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多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表明，毛泽东长期以来有“反智”情结和“反文明”情结，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观察他这两个情结的一个样本。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个人卫生习惯上仍然对文明持抗拒态度（如讨厌洗澡、刷牙），自然更谈不上对稍高层次的现代文明的尊重了。毛泽东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之类让“大老粗”扬眉吐气的话指导国事，于是他领导下的中国就沿着反文明的方向行进。

1950 年代中共曾一度奉行“全盘苏化”的方针，苏共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多少影响了中共领导集团的观念，那时苏联流行的文明习俗和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里深受欢迎。许多 1950 年代的大中学校学生的外国文学和音乐修养基本上都来自“全盘苏化”时期苏联文化的熏陶。然而，随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彻底失败，他在国际共运阵营里的威信遭到重创，毛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之梦从此破灭。面对苏共和大部分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轻慢，恼羞成怒的毛泽东倾全力于中苏论战，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即于此时问世。中共尊奉的佛教高僧赵朴初的逢迎之作“某公三哭”（又称“哭三尼”，指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经《人民日报》发表后，更是在坊间广泛流传。“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成了妇孺皆知的口号，中苏两国关系从此恶化。在“反修防修”的旗号下，苏联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以及比中共先进的苏共党文化均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

当毛泽东 1966 年把“文化革命”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推向疯狂的颠峰时，中国在文化领域里实际上被引导到全面反文明的方向上去：不仅反对西方的文明，也反对苏联的文明；既反对外国的文化，也反对本国的文明传统。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同时又发展出了一整套现代愚昧来替代文明与文化。正是在这种现代愚昧的支配下，“挥舞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等充满了中国古代民间神巫文化色彩的祈祷赞神仪式，挟权力之威席卷 1960 年代的中国大地。

“文化革命”在苏联提升并保持了国民的文明程度，而在中国却降低并毁坏了国民的文明素质。“文革”之后人们批判这场政治运动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文革”的有形破坏上，却较少谈到“文革”的无形破坏。事实上，“文革”对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毁灭性打击，后果深远。

时值“文革”40周年，回溯这段历史及其影响，令人感慨颇深的是，今日中国国民的文明程度仍然难以追比当年苏联国民的文明水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西方的现代文明里只选取了商品和技术，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仍然持排斥态度。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国社会在疯狂追求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道德和伦理日渐消亡。精英层文明程度的退化和道德堕落尤其触目惊心，物欲、肉欲、权欲成了许多精英的唯一追求，并且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

中国反文明的“文化革命”和缺乏文明熏陶的“革命精英”所留下的这些重创，已经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沉重负担。由此来看，中国的不幸不仅在于无法拥抱苏联式的文明建设，还在于中国式的“文革”不死。消灭文明不难，重建文明却实非易事，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背离文明而走向现代化。如果要问“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是否进步了”这个问题，仅从价值观念和社会伦理的角度去评价，恐怕很难回答一个“是”。这是个有关文明兴衰的大题目，中苏两国“文革”的比较研究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假如说，极权主义统治是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家难以逃避的噩梦，那么中国的灾难比苏联要严重得多，中国特色的“暴力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对现代文明的破坏，将对21世纪中国的演变路径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苏“文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仅涉及“文革”这一研究领域，它同时属于共产党国家文明的比较研究，而后者对认识共产党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作者说明：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宋永毅先生提供了一些中国的史料，特此致谢。

注释：

- (1) 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2) *China Quarterly*, No. 103 (Sept., 1985), pp. 534—537。
- (3) *Ibid.*, p. 534。
- (4) Rod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5) David L. Hoffmann. *Stalinist Values: The Cultural Norms of Soviet Modernity, 1917—194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8。
- (6) *Ibid.*, p. 39。
- (7) 出处同注(1)，第8—40页。
- (8)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45年出版)，第354页。
- (9) 出处同上，第369页。
- (10) 参见高王凌的“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载《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
- (11) David R. Shearer. *Industry, State, and Society in Stalin's Russia, 1926—193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2) 出处同注(1)。
- (13) Sheila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8。

- (14) 出处同注(1)。
- (15) 出处同注(5), 第40页。
- (16) Catriona Kelly and David Shepherd. *Russia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3。
- (17) 出处同注(8), 第484页。
- (18) 出处同注(13), 第17页。
- (19) “文化革命开始了”, 《人民日报》社论, 1958年6月9日。
- (20) 新华社1949年4月11日报导, “实现苏联文化革命计划, 青年团员是积极参加者, 卡夫坦诺夫赞扬共青团学术成就”。
- (21) “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 ‘文化革命’、‘技术革命’”(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303/5304/20010608/484747.html)。
- (22) 新华社1956年9月17日报导。
- (23) 刘少奇, “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 新华社1958年5月27日报导。
- (24) 新华社报导,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 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胜利,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闭幕, 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闭幕式”, 1964年8月1日。
- (25) 新华社报导,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1964年12月31日。
- (26) 例如, 在新华社1964年11月27日关于“陆定一副总理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讲话, 会劳动又会从事文艺活动的人是最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导中, “文化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是混用的, 两者并无区别。
- (27) 曹禺, “文化大革命万岁”, 载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 (28) Chris Ward, ed. *The Stalinist Dictatorship*. London: Arnold. P. 112。
- (29) 出处同注(13), 第6页。
- (30) 出处同注(13), 第80页。
- (31) 出处同注(13), 第108页。
- (32) 原载莫斯科的 *Ogonyok* (《精神》) 杂志, 1936年第1期第22页, 引自沃尔科夫的文章“文化的概念, 1935年到1938年: 苏维埃的文明化和斯大林时代的日常生活”。V. V. Volkov, “Kontseptsia kulturnosti, 1935—1938 godei: Sovetskaya tsivilizatsia i pochnostsi Stalinskovo vremeni (Conception of Culture, The Years from 1935—1938: Soviet Civilization and Everyday Life of Stalin's Time.” Moscow: *Sotsiologicheskii zhurnal* (Sociological Journal), 1996, No. 1—2, pp. 194—213. V. V. Volkov 是俄国圣彼得堡市欧洲大学政治与社会学系教师。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总第94期))

~~~~~

【书刊评论】

一部校正“集体失忆”的力作
——读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

• 何 蜀 •

对“文化大革命”诸多历史真相的“集体失忆”, 是年代已久的状况了。对这一状况, 有人担忧, 有人愤慨, 有人失望, 有人熟视无睹, 而像周伦佐先生这样持续地执着于校正这种“集

体失忆”，不但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友人、熟人或不熟的人的回忆不厌其烦地认真加以校正，而且发愤写作完成这样一部大著的，实在少见。

周伦佐可算是那场“大革命”的过来人，为了那场“大革命”，他坐过两次监牢，武斗中险些死于非命，亲眼看到心爱的女友——全城最美丽的女孩中弹倒在自己身边……中国大陆像他这样投入过造反运动的人何止千万，然而，当年叱咤风云豪情万丈的“红色造反者”们，如今却大部分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愿再去回忆那些对他们的一生来说至关重要的岁月。而且，愿意回忆那些岁月的少数人中，能进行冷静反思的又极少。一般来说，文化素质较高的，始终坚持了继续学习和不懈思索的，比较能够反省、反思，而其他人则大多难以跳出历史的阴影，往往止步于“蒙冤受屈”，“上当受骗”或“青春无悔”的心理层面，有的甚至在面对社会不公、个人权益受损的现实时，还会稀里糊涂地妄想“再来一次文革”。周伦佐这部书，则不但对那十年特别是其中造反运动的三年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谓站在民间立场上研究文革并对造反派问题作出全方位深刻研究的第一部力作。

此书最重要的内容当然是对造反派的研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所积累的感性素材，从理论上剖析了“造反红卫兵与保守红卫兵的分野”、“三年造反与十年‘文革’的区别”、造反派的构成与演变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力图“从性质上分清造反与保守的区别”，“从时间上分清三年造反与十年‘文革’的区别”，“从动机上分清毛泽东与造反民众的区别”。作者的这些论述，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含混不清的概念和似是而非的结论，使曾经被随意涂抹和故意掩盖的历史变得清晰起来。

在分析论述中，作者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比如，对造反派产生的原因，作者提出了一个社会“圈层”的观点，作者认为：

从最宽泛的角度考察，“文革”中各种主动性人群的激烈行为，都是社会边缘群体利用毛泽东开展党内“路线斗争”提供的机会，对中心秩序的打破和对自身权利的争取。只不过“中心—边缘”式结构的社会圈层又是多种多样的：有以大民族为中心而以小民族为边缘的族类圈层，有以男性为中心而以女性为边缘的性别圈层，有以成年人中心而以准成年人边缘的年龄圈层，有以统治阶层为中心而以下层群众为边缘的等级圈层，在统治阶层中又有以掌握权力者为中心而以丧失或者向往权力者为边缘的权力圈层，在下层群众中又有以红色出身者为中心而以黑色出身者为边缘的成份圈层……。这些社会圈层，大者存现于全国范围，小者存现于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机关单位。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主要爆发于年龄圈层、性别圈层、族类圈层，那么中国同时期的民间造反运动便主要爆发自年龄圈层、成份圈层、等级圈层、权力圈层——并表现为青年学生造反、非“红五类”子女造反、下层民众造反、机关干部造反。“文革”中这几个圈层边缘人群的借机造反，还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学生身上就不只体现着一种边缘特性，而且学生中“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的边缘特性及其造反指向，也有完全不同之处。这都需要深入分析和严格区别。

这个“圈层”观点，在书中用得比较多，比起毛泽东的那套人为制造“阶级”对立的“阶级分析”方法来，显得更切合社会实际和一般人的感性经验。不过，在论述文革这样史无前例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时，以“圈层”来分析造反派的成因是否十分准确，还可商榷。至少，这里忽略了文革前十七年党化教育给广大民众心理和思维方式造成的重大影响和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难以说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并非受过打击迫害或并非处于某种“圈层”边缘的人们，仅仅出于“理想主义”的激情或“听党的话”的习惯而投身于造反运动。当年闻名全国的3211英雄钻井队，响当当的产业工人，又正处于令人目眩的荣誉的顶峰，并未受到任何打击迫害，只因为看到全国的文革形势，为了“紧跟毛主席”，就毅然参加造反，可算典型的一例。

此外，书中关于“红色”、“黑色”与“杂色”人群的划分，也使人感到有变相的“阶级划分”之嫌。当然，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本书中可以商榷的地方，细节上的错漏处，都时有所见。在论及文革中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时，书中认为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成为毛的抗衡力量，而且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周对毛使出的“敲山震虎”手段，“借林之手揭毛之短”。这类论述虽有新意，但尚嫌缺乏实证的依据。本书的最后两章，作者试图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上来分析造反派，有的段落就显得偏离主题较远，似乎是另一部书的内容了。不过，从整体上看，作者的许多论述不落窠臼，独具一格，而且是很见地，发人深省的。

周伦佐不是专门的历史研究学者，他主要从事的是哲学、心理学、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的“体制外”研究。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他的书中才会出现许多充满思辨色彩和哲理深度的精彩论述。

比如，在论及早期红卫兵的“造反”时，书中写道：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造反”？

分明是将特权阶层对无权阶层的隐蔽性剥夺公开化。

分明是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文明式迫害野蛮化。

保守红卫兵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和“资产阶级教育黑线”时兴起的，造反红卫兵却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兴起的。虽然批判的对象都是“资”字号，但前者实为社会生活中残存的现代人文资源，后者实为社会等级中一贯整人压人的官僚阶层。

等级地位规定的具体行为动机，二者的差别非常分明：保守红卫兵是为了清除“阶级”异己和“血统”异己，造反红卫兵是为了改变等级地位和政治处境。

同是争取个人权利，保守红卫兵想争的纯粹是特权等级的垄断权，造反红卫兵想争的只不过是无权等级的平等权。

在论及毛泽东时，书中写道：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来说，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绝非进步而是倒退，绝非先进而是落后，绝非革命而是反动！

在论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时，书中写道：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主要不是政见分歧而是权力失衡。自1935年遵义会议起开始共事，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刘对毛始终小心遵命，不敢越雷池半步。1959—1966任国家主席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刘为缓解三年大饥荒造成的经济颓势所采取的务实政策，即使与毛的极端倾向有些抵牾，但初衷还是为了维护毛及其政权，根本说不上水火不容式的政见分歧。要害在于刘的务实政策偏偏与毛最为敏感的权力问题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变得复杂化。毛本来就是权术大家，在他眼里，权力问题不仅是革命的根本，而且是政治的要害。小心翼翼的刘偏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禁忌，尽管有可能不是蓄意。

书中还随处可见作者经过深思的独到见解，比如：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解构主义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很多第三

代诗人把毛泽东和“文革”当作自己的精神太阳和历史家园。于是有人认为西方造反青年和中国先锋诗人与毛泽东思想相通。这当然是巨大的误会。看起来，“文革”中毛泽东的作法，与德里达消除中心和瓦解等级的解构思想颇为相似，但对于毛泽东，这只是个性行为的特征而非思想观念的实质。真正对西方造反青年和中国先锋诗人产生影响的，只是“文革”中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至于说到思想观念，他们与毛泽东简直是南辕北辙：一方是张扬现代个体主义，另一方则是绞杀现代个体主义。而且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最终所要导向的，恰好是建立以自己为绝对权威中心和等级更加森严的极权制度。这难道是他们所向往的吗？

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励造反的本意，是为了阻止名为“修正主义上台”实为体制内民主改革的发生。在当时，最可能与这种改革产生利益契合的人群，正是对现实心怀不满并渴望改变现状随后成为造反派的黑色子女和杂色人员。可是仅仅因为暂时的利益契合，最可能支持这种民主改革的造反派人群却追随了反对这种民主改革的毛泽东。这确实是个根本的误会。

两种相反的走势表明，法国大革命和“文革”几乎是南辕北辙。前者是体制外自发的人民革命，为了给逐渐趋于疲惫的人们不断注入新的精神活力，必须不断淘汰难以胜任的领导者而让位给更为激进的领导者，直到再无更激进的领袖出现为止。后者只是体制内受控的群众运动，中央文革、造反派领导层甚至造反组织，一旦干扰了毛泽东开展运动的部署、违背其稳定大局的考虑、妨碍其恢复正常秩序的意图，就会被无情淘汰，保留下来的只能是那些能够满足控制需要的人。

中国1976年以后指向体制内民主改革的政治转变，实际上是由高层穿着“守旧派”外衣的人完成的，自命“革新派”的人，却被历史逼到了民主的对立面。毛体制高层内部两种政治力量最终的角色定位，并非来自他们的自觉选择，而是历史趋势和政局演变及其合力不自觉驱使的结果。

还有对“有名无实的造反派掌权”的分析，对“极权体制下的三个政治整饬运动”（延安整风、反右、文革）的比较，对“二月镇反”内幕的探讨等等，都有不少值得认真研读的内容。

此书是专门研究和论述造反派问题的，不过，作者的思考并不局限于造反派这一方面，本书的第三篇（七、八、九章），专门对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反历史社会理想”，以及毛泽东与造反派的“利益契合”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深入的专题研究，而且有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独到见解。关心毛泽东问题，关心当代中国问题的读者，都有必要读一读这些内容。

本书中不时出现的一些作者对个人经历及作者所在的四川省西昌地区文革情况的回忆，很不同于其他大城市文革的特点，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若作者能进一步写成专门的回忆，应该是另有独特价值的。

盼望早日读到作者的新著！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 www. cnd. org /](http://www.cnd.org/)
